

百色起义策源地，芒果之乡脱贫“芒”

本报记者 张典标

新闻里播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节目时，66岁的岑忠香经常看得饶有滋味。可等到自己大学毕业的儿子岑参回家卖芒果时，他就变了脸色，气不打一处来，饭桌上也不和儿子说话。

这该死的芒果！

当年儿子从坛河村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高分考进中山大学，村里人都夸他教育得好，必定有大出息，可是给他长了不少脸呢。坛河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县林逢镇。田东是国贫县，百色起义在这里打响第一枪，这里也是著名的芒果之乡，田东产的芒果皮薄肉厚、汁多味浓。

从前每次过完暑假，儿子的那些同学都追着儿子要老家的芒果。当时岑忠香心里也美滋滋的，总要交代岑参多带些芒果，往鼓鼓的包里再塞几个果子。现在倒好，好不容易供出来的大学生，反倒回家卖芒果。岑忠香越想越气，自己累死累活种芒果，到头来培养了个卖芒果的……

种芒果确实累。

每年七八月份采摘季，正是广西最热的时候。天上一团团毒辣辣的火球狠狠地烤着，山坡上果农晒成砖红色的脸上豆大的汗珠直冒，为了防果蝇往身体里钻，果农穿的不透风的粗布长袖外套，很快吸饱了汗水，不少地方被晒出盐渍。最热的时候，甚至连塞在鼻孔里的“小胡子”也都泡在汗水里，逼得果农只能张嘴呼气。

2012年，岑参就是看父亲这么辛苦，果农还不一定卖出好价钱，才决定返乡搞电商卖芒果。在此之前，果农卖果要麼到县城的批发市场，要麼到外地经销商进村采购。遇到行情不好或者经销商压价的时候，果农只能吃哑巴亏。

田东县林逢镇东养村党总支书记陆秀缎记得，有一年芒果一斤才六毛钱，而每斤成本要一块二三，果农请人采摘再找车运到批发市场就是亏上加亏，以至于有人直接把芒果从山上拉



果农黄大伍正在打包电商下单的芒果
(8月7日摄) 本报记者 张典标摄

到河边倒了。

岑参干电商的时候，整个田东县只有两三家淘宝店。刚开始在村里收果子，果农搞不清楚咋回事，瞧见岑参光挑好果，次果全剩下，索性好果次果都不卖了。原来，果农此前一直把好果次果混着，取个中间价一股脑全卖了。岑参好说歹说，给果农算了笔经济账，果农才明白，以更高价格把好果卖了之后，收入已经超过原来混起来卖的全部收入。剩下的次果即使价格偏低，卖了也是干净。

岑参占了“先发优势”，2012年最开始一天只能发上百件，每件10斤果；到了2014年，每年能发10万件，销量100万斤。销售额也从

2012年的几十万元变成如今的一千多万元。人手很快不够了，每年7月到9月份，岑参每天得请30多人帮工，一天80到100块钱。一言不发的父亲也跟着帮忙打包、发快递。

“除了发展电商拓宽销售渠道之外，田东县还加大了技术创新力量投入，通过早花摘除技术，规避二三月份花期时的寒潮，保障芒果产量。”田东县农业农村局芒果试验站站长陆弟敏说，“与此同时，田东县及时补上基础设施短板，把产业路修到了每个果园。”

林逢镇林驮村那王屯果农黄大伍记得，过去都是土路，一下雨人都走不了，更别提车了。采摘的芒果运不出去，没两天就烂了。如今一到

7月份，几公里长的产业路挤满了车，有拉芒果的货车，物流车，也有采摘芒果的私家车，还有运送外地采摘工的大客车。路边摆着盛满芒果的竹篮，热闹极了。到了春节，村民聚餐时，还按照当年的芒果收入分成50万元的一桌、30万元的一桌、20万元的一桌……

陆弟敏介绍，2014年田东芒果15万亩，现在芒果版图扩大到34万亩，差不多适合种的地方都种了。而每斤芒果的价格也从当初的一块多变成现在的四五块，甚至七八块。

黄大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芒果50株，每株产约80斤，按照每斤4块钱的价格，一亩的收入为1.6万，扣除成本，平均下来每亩净收入八千到一万二。

“现在村子里都是芒果楼、芒果车、芒果盐。”林逢镇林驮村副主任凌朝案说，“村里原来种玉米，后来改种甘蔗，现在种芒果。种玉米的时候只能吃饱；种甘蔗费力挣钱也少，年轻人都外出务工；种芒果，年轻人回村从事芒果相关产业一年二十万，一点不比打工差。”

田东县扶贫办副主任曾焕伟介绍，芒果产业带动了田东5500余户贫困户脱贫增收，占田东全部贫困户的三分之一。2019年，田东摘掉了国贫县的帽子，芒果立了大功。

今年的芒果季，果农靠着电商顺利卖完果子，没受到疫情太大的拖累。“虽然遇上疫情，但除了电商之外，对口帮扶田东的深圳坪山区、驻扎在田东的碧桂园帮扶团队等力量也为芒果销售出了很多力气。”岑参说，“今年碧桂园通过直播带货和自身平台采购销售了66多吨芒果和近8吨芒果干，价值137万多元，帮了我们大忙。”

渐渐地，那些对岑参返乡有闲言碎语的村民，也在岑忠香前面夸他儿子“有出息，带了好头”，岑忠香干涸的脸上泛起了久违的笑容。

怒江大峡谷雨季刚过，三河村傈僳族贫困户李兴明家忙着起新楼。眼瞅着草果季将近，李兴明站在院里，催促工人加紧施工。

“草果熟了，就没空管房子咯。”62岁的李兴明和其他村民一样摩拳擦掌，想在草果季大干一场。

三河村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鲁掌镇。怒江州地处中缅交界地，98%的土地是高山峡谷，是中国最贫困的“三区三州”之一。

三河村，因有三条发源于高黎贡山的溪流穿过而得名。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光照不足，自李兴明记事起村子里前屋后、陡坡悬壁，只要是能种的地都种着“苞谷”，也就是玉米。在这里，一亩精耕细作的玉米地最多也只能产100多公斤。

“种苞谷只能保证不挨饿。”李兴明再辛勤劳动也难以致富，自己和妻子落下一身病更让家庭雪上加霜。

自从2013年以来，三河村进驻了一批扶贫干部。从不通路，到每个小组都通了硬化路，三河村悄然发生着改变。

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干部还给村民带来了一批政府补贴的草果苗。“种苞谷，没出路。”三河村党支部书记唐才文向村民介绍，草果喜欢阴凉有水的地方，三河村背阴湿润的环境正好适合这种经济作物。

李兴明将信将疑，决定一试。从2014年起，逐步放弃种植苞谷，改种了草果。“价格最高的一年赚了10万多元，现在挂果了100亩，价格不好也能赚个3万多元。”李兴明还建了草果加工点，帮助其他村民加工生果还能多挣几千元。

李兴明是怒江州发展草果带动脱贫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三河村共种有草果1.27万亩，挂果8000多亩。在村干部和种植大户带动下，陡坡壁耕的苞谷地逐渐变少，村民祖辈辈吃的苞谷饭变成了大米饭，一日两餐变成了一日三餐，人畜混居的杈杈楼变成了混凝土小楼房……草果挂果后，敢为人先的种植户们收获的亩均产值是苞谷的5倍以上。

不仅在三河村，如今在怒江大峡谷，一条“草果长廊”沿江而上。火红的草果正成为群众脱贫的重要产业，未来还将是群众的致富果。

为增加草果的附加值，帮扶怒江州的中交集团还在当地投资建设了怒江香料产业园，从草果的种植、产品研发、品牌营销等方面入手，帮助这一特色农产品进行产业链延伸、提升附加值。

怒江州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草果产业成为怒江带动能力最强、辐射面最广的扶贫产业，带动怒江州沿边3个县市116个村4.31万农户发展了111万亩草果，受益群众达16.5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8.24万，占怒江州贫困总人口数的30.77%。

(记者赵珮然、杨静)新华社昆明电

怒江大峡谷的草果红了

花菇助脱贫

▶大图：11月12日，在城口县修齐镇花菇扶贫产业基地，村民在采摘花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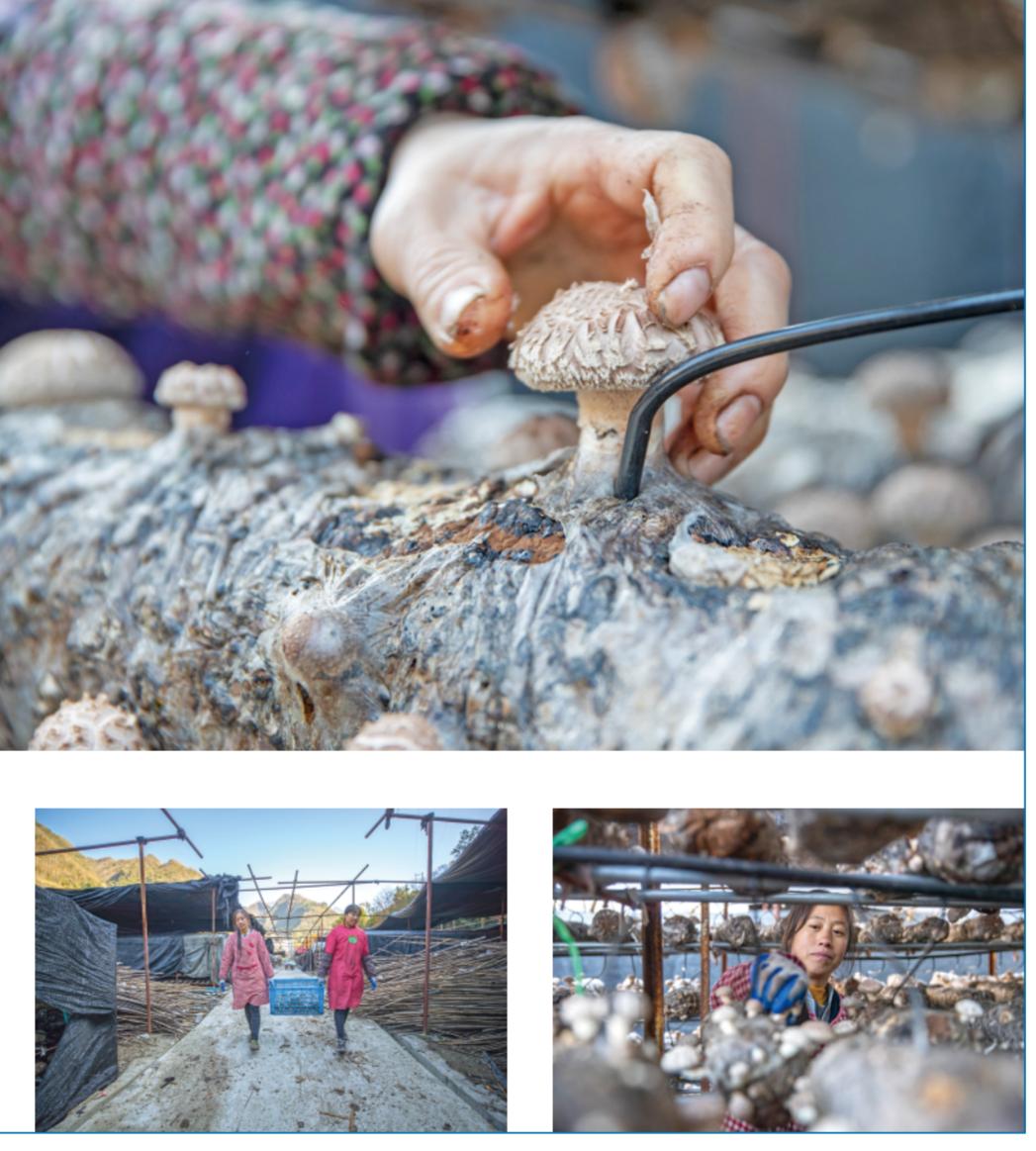
▼小图从左至右：

11月12日，在城口县修齐镇花菇扶贫产业基地，村民在整理采摘的花菇。

11月12日，在城口县修齐镇花菇扶贫产业基地，村民在搬运采摘的花菇。

11月12日，在城口县修齐镇花菇扶贫产业基地，村民在整理采摘的花菇。

重庆市城口县地处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近年来，城口县修齐镇积极发展花菇产业，以“公司+基地+集体+贫困户”的模式，带动周边乡镇的农户发展家庭农场，推动农户脱贫增收，助推乡村振兴。新华社记者黄伟摄



咬定“茶”山不放松

安徽石佛村依靠茶产业脱贫致富见闻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姜刚)立冬时节，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包家乡石佛村境内，3300多亩梯田茶园绿意绵延、生机勃勃。改造老茶园，打理新茶园、维修茶叶加工机器……记者来到石佛村看到，这里的村民们正辛勤地劳作着，为来年的丰收播撒希望。

“我家有8亩老茶园和5亩新茶园，今年的茶叶收入有5万多元。”正在从事生态护林工作的脱贫户冯立新说，原来种植传统农作物，光线不好，水不好找，亩均收入不足1000元。村里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后，乡亲们从茶产业中找到了脱贫致富的“钥匙”。

石佛村背靠大别山主峰白马尖，平均海拔800多米，是当地名茶岳西翠兰的核心产区。20世纪80年代前后，这里生产的茶叶价格低廉，制茶填不饱肚子，当地人无奈之下毁茶园种杂粮。“萝卜山芋当口粮，养女莫嫁石佛郎”，曾是这里村民贫困生活的写照。

要想脱贫快，全靠产业带。“面对贫困发生率超过四成的困境，我们只有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石佛村党支部书记王军说。2012年以来，该村结合当地实际，将茶产业确定为脱贫主导产业。

在“改老建新”上，石佛村用好扶贫政策，一

方面，推行“四改”(改园、改树、改土、改管理)，将原有2000亩低产茶园改造为高产茶园；另一方面，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新建约1300亩高标准茶园，目前，全村已建高标准茶园3300多亩，人均茶园约2.5亩。

紧接着，制名茶、拓销路，摆上了石佛村“两委”和茶农的议事日程。作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岳西翠兰手工制茶技艺传承人，冯立彬正在合作社指导工人编织制茶工具。得益于“改老建新”政策，他领办的一家茶叶专业合作社近年来经营规模逐步扩大。

“茶园改造前，茶叶种植不统一，采摘不规范，制作的茶叶卖不出去，一年到头还亏本。”冯立彬深有感触地说，“这几年，采摘、加工实行标准化，我也专注于手工制茶，现在茶叶好卖了，回头客也多了。合作社的销售产值从8年前的100多万元增加到今年的400多万元，带动130户茶农种茶，其中四分之一是贫困户。”

石佛村引进石佛寺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合作社，贫困户以茶园和资金入股，村“两委”注入40万元扶贫资金，探索“村委会+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管理模式，引导带动贫困户发展茶产业。

在“改老建新”上，石佛村用好扶贫政策，一

方面，推行“四改”(改园、改树、改土、改管理)，将原有2000亩低产茶园改造为高产茶园；另一方面，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新建约1300亩高标准茶园，目前，全村已建高标准茶园3300多亩，人均茶园约2.5亩。

2014年以来，石佛村共有511人脱贫。2016年，石佛村脱贫出列。目前，全村贫困发生率已由2014年的40.11%下降至0.22%。

在王军看来，脱贫摘帽后，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还是要在茶产业提质增效上做文章。从去年开始，石佛村启动茶园有机认证的工作。“为了让村民理解和支持，村里组织开展有机茶园管理培训，茶农买有机肥，村里补贴40%，茶农买除草机械，村里补贴一半。”

“2017年，我新建了4亩茶园，去年又新建了6亩茶园。”在自家的新建茶园里，村民陈帮贵边查看茶树生长情况边说，“村里现在带领我们种有机茶，我们对发展茶叶奔小康充满信心。”

“我们咬定‘茶’山不放松，未来不仅要走种有机茶之路，也要走茶旅融合发展之路。”王军说，以茶产业发展巩固脱贫成效、推动乡村振兴，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

新华社银川11月12日电(记者张亮)罗曼沟村位于六盘山西麓的沟沟壑壑中，一场初雪，让半山腰处新修的村史馆红色砖墙格外显眼。走进村史馆，展板上的一段村庄“改名趣闻”成为这个小村庄百年变迁史的最佳注脚。

罗曼沟村位于宁夏最后一个尚未脱贫的国家级贫困县西吉县马莲乡，村里人大多姓安，百年前属于同一宗族。“晚清的时候安氏先人为躲避战乱，从甘肃兰州向东逃难，最终来到西吉县马莲乡的这道沟沟里落脚，所以这个村子最早就叫‘落难沟’村。”罗曼沟村村支书安发银说。

小时候，安发银还能经常听到老一辈人把村子叫“落难沟”，谈起当年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村里人嫌“落难沟”太难听，渐渐地把村子叫“落满沟”，寓意种的粮食落得满满都是。可是，“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山大、沟太深，老百姓粮食“落满沟”的念想多年一直落空。直到2014年建档立卡立卡时，全村还有近一半是贫困人口。

精准扶贫开始后，落满沟村自然条件最差的一个组易地搬迁到黄河灌区。剩余的村民就在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的带领下，奋力实现就地脱贫。随着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加大，泥路变硬化路，窑洞变砖瓦房，通了自来水，有了宽带网，日新月异的落满沟村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升级着村民潜意识中对家乡的期盼。

“村干部不知怎么常常在材料中把落满沟错写成‘罗曼沟’，后来村民们都觉得罗曼沟更好听，更符合现在村子的气质，就索性将错就错把村名改为‘罗曼沟’。”安发银说。

贫困村脱贫需要好颜值，更需要好产业。2018年，帮扶单位固原市委组织部为了打造村民稳定增收的肉牛养殖产业，引来了金融“活水”，协调银行为罗曼沟村开通无抵押小额贷款绿色通道，最高单户贷款额度达到100万元。

贫困户安海明种着30多亩靠天吃饭的山坡地过了半辈子，眼瞅着村支书靠贷款养牛发家致富，他也壮着胆子向银行贷款30万元，建牛棚、买铡草机、进牛犊，第一年养了21头牛就赚了10万元。

如今，罗曼沟村几乎家家养牛，全村牛存栏接近1000头，累计发放的580万元大额贷款只有3户人家分期偿还，其余都按时还款。全村也在今年实现了贫困户清零。

落难沟不再叫落难沟，落满沟也已牛羊满沟。安发银最近总觉得村史馆只有展板记录这段历史太苍白。“计划跟村民们征集一些老物件放在村史馆，不然好日子过惯了，后生们都不知道先人是怎么苦过来的。”他说。

刘春生创业记

不仅自己成功脱贫，而且还创办了全县第一家扶贫车间，带动30多位贫困户增收，这是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原贫困户刘春生近些年颇为自豪的事情。

43岁的刘春生来自长汀县古城镇马头山村，他的人生经历颇为坎坷：几年前，因为身患糖尿病治疗不及时，导致他左小腿截肢；为了治疗小儿子刘海文的听力残疾，他不得不又东挪西借……两次的“穷”折腾，让刘春生一家陷入困境。

就在他近乎绝望的时候，2016年底，得益于当地出台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刘春生一家搬到了位于长汀县策武镇的火车南站幸福小区。“这样的好事做梦都想不到。只掏了一点钱，就住上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大房子。”刘春生说。

有了安居乐窝，还要想办法兴业。搬进新家不久，刘春生的妻子邓松娣就在幸福小区附近的稀土工业园找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而他自己，则在幸福小区管委会从事公益性岗位工作。

2018年，在从事小区保洁员工作过程中，刘春生发现小区贫困户中还有不少妇女因照顾家庭、小孩不能上班就业。于是，他向小区管委会主任赖进礼建议，能不能引进一两家企业，把扶贫车间办到小区内，吸引不能外出的劳动力就近就业。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方联系企业，政府提供免费场地，人社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很快，刘春生创办的棒垒球加工扶贫车间在2018年底顺利开业了。

家住幸福小区的贫困户王石二说，由于平时要照顾小孩，她无法长期外出务工。扶贫车间的出现，让她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的愿望。“车间实行计件工资，工作时间灵活，现在每个月收入将近2000元。”她说。

“贫困不能成为自暴自弃的理由。”在创办扶贫车间之余，刘春生还学会了养蜂技术，在老家马头山村养了37箱蜜蜂，年收入超过3万元。刘春生高兴地说：“今年我还用卖蜂蜜的钱，对房子进行了简单的装修。”

然而，创业之路远比想象中要困难。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刘春生的棒垒球加工扶贫车间不得不停止营业。为此，刘春生心急如焚，他四处寻找商机。

终于，小区附近一家电子企业